

# 良知,作家的饭碗

□李鸣生



《震中在人心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我很欣慰。因为它让我想起汶川大地震,想起惊天动地、山崩地裂的那一幕,想起躺在废墟下的十万亡灵,特别是其中那两万多个花朵般的孩子和学生!正是他们,召唤着我三次冒险去了灾区;也正是他们,激励着我在4个月拼命写完了这部25万字的书稿。因此这个奖,与其说是富有良知的评委和为本书投票的37821位网友对我的一种肯定,不如说是送给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十万亡灵的一份安慰。

我个人认为,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,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、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,同时也是备受争议、最具风险的一种创作。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,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、最直接、最尖锐地面对社会的挑战、现实的挑战,同时也是面对作家自身的挑战。它挑战的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、现实最残酷的伤痕,权贵最阴暗的虚假;它挑战的是作家的人格与思想、良知与底线!

2008年的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,震惊了中国,也震惊了世界。面对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,是迎上去,还是回避躲闪,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!但它挑战的不是我的胆量,也不是我的才华,而是我的良知!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,四川是我的家乡,身为一个作家,家乡有难,避而远之,袖手旁观,岂有此理!何况,面对灾难,作家不应缺席;面对死亡,文学不该沉默!于是在良知的驱使下,我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去了灾区。采访团结束后,我又独自两次闯入灾区。其间,我曾强行冲进北川;我曾遭遇6.4级余震;我曾四次进入成都儿童医院;我曾五次进入成都精神病院;我曾走遍灾区所有重点倒塌的学校;我曾与近千名家长在废墟上为死去的孩子过儿童节;我曾在雨中跪在数百个孩子的坟前以泪洗面。尤其是我第三次去灾区,住在最偏远的红白镇的帐篷里,中午的高温高达42度,连体温计都能爆炸。晚上倾盆暴雨,帐篷潮湿无比。而且帐篷里苍蝇、蚊子满天飞,我只能左手驱赶蚊虫,右手敲击电脑。由于采访繁重,无法入眠,很快我便病倒在帐篷里,打了一个礼拜的吊针。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留下。在三次近两个月的采访中,我行程一万多公里,走访了数百个军人、医生、教师、护士、镇长、灾民,录下250多个小时的录音,记下40多万字笔记,拍下了9000余张照片,经历了十多次山洪爆发和上百次大小余震,还掉了十多斤肉。

然而,一旦真正进入写作,如同面对一份从未见过的国际考卷,对我又是一

次极大的挑战——写什么?怎么写?这看似是一个纯粹的写作问题,其实仍是一个良知问题。良知是什么?良知是一个人天生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作家的饭碗,一个作家的底线。丢了这个饭碗,写作便失去意义;越过这个底线,就不能叫作家。因此良知告诫我,对汶川大地震的写作,必须是一次纯粹的写作;必须以诚实的态度面对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、500万苦难的苍生、十万个被毁灭的生命;必须揭示灾难的真相和灾民的精神创伤;必须表达灾民的哭声与泪水、诉求与愿望!而不能回避,不能粉饰,更不能把鲜血变成美酒,把悲剧变成喜剧,把灾区变成秀场,把死尸变成活人!这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。否则愧对废墟下的十万亡灵,也愧对全国数十万救援大军!尽管曾经埋葬了十万生灵的汶川大地震,是我们民族巨大的一次伤痛,伤痛之后到底能痛出一批什么样的国民,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,我并不知道;但我能肯定的是,这场灾难确实给历史、给后人、给文学留下了太多的血淋淋的记忆,需要更多的作家以及政治家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地震学家去思考,去书写。而我的《震中在人心》,充其量是对现实社会的一次即兴发言而已。

记得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·略萨说过:“文学,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。”我对这句话非常赞同。的确,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,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风云震荡、令人心潮澎湃的时代;我们面临的中国,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动万分而又悬念迭起的中国。那么面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现实,我们到底是先“发言”再“唯美”呢,还是先“唯美”再“发言”呢?

这肯定是一个问题。当然了,面对这个时代,尤其是面对现实,文学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,甚至是无可奈何的。在伟大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面前,任何作家都不过是个小学生,无法转动乾坤。正如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·茨威格所言:“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,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。”尤其是在这个流行假话的世界上,真要对社会发点真言,还真不容易。

但有一点,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到的,那就是:在任何生存环境下,坚守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,坚守一个作家写作的底线。因为在我看来,作家来到这个世界,就是来承受苦难经受风雨的,就是来忍受孤独寂寞的,就是来探究真相说出真话的,就是来承担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份担当的。这是作家的使命,也是作家的宿命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否则要作家干什么?就像医生,职责就是治病,至于能不能治好病、能治多少病,是另一码事。但如果你连病人都不同间甚至视而不见,还当医生干什么?当年鲁迅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声音,当今作家的声音呢?好像很稀少,很微弱。

最后我还想说的是,以鲁迅命名的“鲁迅文学奖”,体现的应是鲁迅精神。鲁迅精神是什么?是“横眉冷对”,而不是卑躬屈膝;是“俯首甘为”,而不是俯首帖耳。当今中国,不缺天才,缺的是良知;不缺奴才,缺的是人才;不缺作家,缺的是像鲁迅那样的斗士。但愿“鲁迅文学奖”能激励更多的作家,像鲁迅那样拿起笔来,挺直脊梁,直面社会,直面人世!

#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特刊



## ●报告文学 获奖作家——

# 为伟大时代而感动

## 面对时代的承担

□关仁山



我搞小说创作,多是关注现实生活。但是,我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里,报告文学是与现实、与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,有“时代的号角”称号。我创作过几部报告文学作品,比如《执政基石》《播火者》,还有这部获奖的《感天动地——从唐山到汶川》,都是描绘时代生活的。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,创作这部书是我的必然选择。祭奠逝去的生命,生命是灾难中最应该珍视的,生命值得舍生忘死去维护,生命是奇迹和祈盼的源头。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,生者承担了灾难的记忆。我想通过两场大灾难的对比,描绘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,透视时代的进步。也许就是这样的视角,完成了历史与时代的链接。

前一段有个说法,报告文学创作是以回顾历史还是以反映现实为主,我觉得,这是一个题材上的争论,落实到创作上,应该考量作家拥有多少精神资源。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、个性化、世俗化、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。社会经济的发展,社会中心向城市、向上层倾斜。在上层那里,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“浮华世界”。报告文学除了认知这个上层世界,还要深入底层百姓生活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:写什么样的题材?为谁写作?这是作家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。我始终认为,对报告文学来说,“写什么”,比小说里的“写什么”更为重要,因为报告文学特殊强调真实性。真实性不是单一的,它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独特、广阔和丰富,以及珍藏 in 庞杂事物背后的价值。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,报告文学应该有强烈的时代感、同步性和敏锐性。

时代感直接关联深入生活问题。我的理解,生活对于作家多么重要。作家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,但这生活除了家庭、朋友和单

位很狭窄的生活,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。作家柳青说过,作家如果脱离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,靠着超然才能够打造出工艺品,而带着泥土气息的艺术之花,只能在土地上培植。所以,这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抓住时代题材,深入采访,还要用慧眼去认识、发掘和提炼。面对时代,要有新的发现。发现生活中真正惊人的东西,在琐碎的生活中寻找震撼人心的故事。所以,我感觉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还辛苦,不仅要拥抱生活,还要解析生活。如果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,对复杂、多变的世界缺乏耐心,叙事说服力就会丧失,就无法使读者信任报告文学。

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,作家必须作出回应。作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和矛盾,但又不能简单书写这些问题,就需要对现实生活艰苦地认知、体验和思考。摆脱浮华和功利,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,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、芜杂、曲折和发展,才能改变我们对时代生活简单的认知。有了新的认知能力,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,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,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。全国有那么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,跟人家比,我在这方面有欠缺,还要深入学习和思考。

说到理想,又回到精神资源上来了。无论是唐山大地震,还是汶川大地震,抗震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可是,我们遗忘了很久。汶川地震,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在灾难中怦然复活。32年前的唐山留下了抗震精神,今天的汶川,是对唐山抗震精神的深化,是对民族心灵的净化与强化。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仁爱中国,建设一个国内各民族相亲相爱、与世界和睦相处的礼仪中国。抗击灾难带给我们的精神资源,是在两次大灾难中,我们的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,非常宝贵。是的,灾难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!也许这是灾难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吧!在灾难的考验面前,在真、善、美的感召下,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反省自身,不断认识自我,不断提高自己。这样的改变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,并且有如春雨润物,潜移默化地、长久地产生影响。这种精神能量是无法估量的!

我们在创作中常常困惑于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中,备感精神资源匮乏。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,肯定世俗化的生活乐趣,这没有什么错误。但是,我们全部停留在这里,注定无法逃脱疲惫之态。有的作品,即便找到了英雄也是抗日英雄,或是时过境迁的英雄。变革的时代对我们心灵有着强烈震荡,读者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实的平庸,崇高感、英雄气,永远是令人神往的。所以,我们的报告文学一定会在时代精神资源里找到灵感,从而完成时代英雄精神的挖掘与重塑!

《生命的呐喊》的获奖,像一片灿烂的晚霞,给我坎坷多舛的人生送来了一颗美丽的黄昏。

我感谢评委,对一个小人物的自传给予了极大的首肯,使一名在文学路上跋涉了三十多年的老作家,登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。这不仅是对这部作品的首肯,也是对一个草根族,对一个底层人奋斗历程的首肯,对一个作家为维权而呐喊的首肯!我要感谢广大读者和网友,感谢出版社,给了我莫大的支持。

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它使一个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的山野女子,走出封闭的世界,闯出一番虽然坎坷但却美好的人生。它使我的生命在文学中闪光。报告文学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社会,认识人,使我一次次地燃起火一般的激情,创作出一部部作品!

谈到报告文学,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会浮现在我眼前,有改变傻子屯命运的村党支部书记,创建了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,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,打死东北虎的元凶,还有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。无论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物,还是罪大恶极的死囚,都曾向我敞开心扉,讲述了他们非同一般的人生。每一次深入的采访,都对我心灵产生强烈的撞击,使我对人生、对人性、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思考。

去采访打死东北虎的偷猎者的母亲,老人老泪纵横道出的一番话令我至今难忘:“嗨,一只老虎被打死了,你们这么多人人都挂念着,可俺们这些人吃不上饭,娶不上媳妇,有谁挂念挂念俺们?”

去采访先进人物傻子屯的党支部书记许振中,当问到他身体状况时,这位铁打的汉子却背对着我,久久不语。我从他微微颤抖的背影上,看出了他内心的苦衷。我采访他妻子,她哭诉出的一番话令我感到震惊。她几次想自杀,她的一对儿女都自杀过被抢救过来了。许振中累倒了,肾小球肾炎,严重肝硬化,肝腹水,全身浮肿得像气球似的躺在医院大门口,却因缺钱住不上院。她攥着借遍全村才借来的50元钱,跪倒在乡亲面前:“求求你们快救救老许吧,他快不行了!”

我感到悲哀,许振中全家拼着性命改变了傻子屯,却无人来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了。多少人都摇过许振中这杆先进大旗,用他们自己的脸上贴金,大旗摇坏了,摇倒了,只剩下一根旗杆,却很少有人问津他的处境。于是,我找到县委书记对他直言不讳,说出许振中一家的困境,以及该如何对待劳模的困境,许振中一家因此而改变了处境。

在这篇《走过伤心地》的报告文学中,我呼唤人们要正确对待先进人物,不要利用他们美好的奉献精神,而毁了他们自身。

在采访著名心外科专家、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时,我问他,你为什么要从那么高的职位上提前辞退下来?他说:“中国的医疗改革,任重而道远。我已经51岁了,再这样耗下去实在耗不起,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、迎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,不如趁自己还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,去建一所医院,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福音,干点实事,也算不枉活一生了!”他还说,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。就拿心血管病来说,全国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,每年仅能手术四五万例,只占百分之一二。

刘晓程说的话令人敬佩,更令人深思。在这篇报告文学中,我赞扬了刘晓程的崇高境界,同时也揭示出中国医疗的现状,以及中国在世界医疗中的地位。

我去采访大兴安岭火灾中被逮捕的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,据群众反映这是一起冤案。我立刻去找该省省副书记,向他汇报案情。17年后,庄的冤案平反了。

每一次采访过后,我的悲悯之心呼唤着我的良知,正义感呼唤着我的责任。尽管我的呐喊微不足道,但是为了明天,为了作家的责任,为了祖国更加繁荣昌盛,我会遵循着良心的呼唤,我将继续呐喊下去!

# 良知的呼唤

□张雅文



## 发扬鲁迅精神

□李洁非



大获用武之地,显然错过了得到鲁迅亲自垂范的荣幸。

这里对鲁迅与报告文学之关系的溯源,乃文学史一点小考据,并非正题。正题是什么呢?我以为是,尽管鲁迅未亲自用创作实践,指点我们如何从事报告文学写作,我们的写作却并不失去如何发扬鲁迅精神这样的主旨。或者说,发扬鲁迅精神仍然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反思并拥有的一种意识。

关于鲁迅精神,如果特别从文学方面来讲,我印象最深的,是他在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《小杂感》(《而已集》)中说的两句话:人感到寂寞时,会创作;一感到干净时,即无创作。他已经一无所爱。

创作总根于爱。这两句含意不那么具体。但也正因有些抽象,我以为反倒把鲁迅对文学创作的观点,说得更内在。他说,“感到干净时,即无创作”。乍看,其意难解。以我理解,鲁迅强调的是,人的心灵倘若“干净”到全无块垒,大概也就失去了爱。如作家还存着“爱”、能够“爱”,他对人生的体验,则无法处在“干净”的状态。他总要追求、总要抗争、总要究辨——一言以蔽之,他还有所“爱”。

也有较为具体的表达,例如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里这样一段: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,称颂革命——讴歌革命,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,社会

## 全景式多角度地描写那场大战

□彭荆风



轮廓在我心中也日渐鲜明;但有些作品却是即使自感熟悉了,还得在体裁上用心选择才能写好。是写成长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?一直使我犹豫不决。

在据有大量素材后,再采用虚构手法写成长篇小说,对于我这个写作小说多年的人来说,不会太难,但在形成小说结构、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,必然要舍弃许多人物、事件;面对那样丰富多彩的史料,我很是舍不得;思之再三,决定还是采用纪实文学来写作。

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,我就写过进军西藏的《搏斗在梅里雪山》,80年代又写过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《一将难求》《有争议的“巴顿”》《覆盖再覆盖》等现实题材的纪实作品,但从事这部被称为历史题材的写作,却越写越觉得难度太大,并不像如今某些人说:历史题材的纪实类文学要比现实题材容易

写(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好写难写之分,能否写好决定于作家的文学功底和对所写素材的掌握是否丰富,理解是否透彻)。因为这场大战役,战场地广,敌人多,战场内外事件繁杂;想要把那大迂回、大包围的高超战略战术的威力,形象、生动、真实地描述出来,就不能满足现有的素材,还得随着写作的进展过程,不断地去仔细了解、访查、分析、综合、筛选,哪些事情可以保留,哪些事情可以删掉,这是很需要用心斟酌,也得像军事指挥官那样细心地谋划全局,像应对每场战斗一样,耐心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;同时还得注重艺术的描写,以加强人物、事件的感染力。我很赞同美国纪实作家们“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”的观点,才能构成一部既具有史料性,又有着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纪实长篇。这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我国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中,更是不乏成功范本,我们应该好好运用。

我对这部自感能“打动我们的心灵,激荡我们的血液”,给读者以鼓舞力的作品,充满深情,更不敢怠慢,所以这12年间,每年我都要用三四个月时间来修改,前后达10次,把书中600多个人物逐一描述,赋予他们的个性。这不断地增加删改,也是不断地加深我对那场大战的认识,从而能去粗取精,更趋完善。

人生有限,在我60多的学生生涯中,却有近八分之一时间在忙这一作品,虽然辛苦却充满了激情与愉快。我很高兴能把这本《解放大西南》奉献给读者!

作家多数是选择自己最熟悉、最感动的人物与事件来写作。

61年前,我参加的解放大西南战役,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军旅生活。那是完成全国解放、彻底结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一次大战。我作为战斗队伍中的一员,随军跨越赣、粤、桂、黔、滇5省,完全沉浸在在那场大战的激昂氛围中,深深被那百万大军向云贵高原、巴山蜀水进发的磅礴气势,以及指战员们勇于拼搏的精神所感动;在充满胜利者的自豪感的同时,出于年轻文学爱好者的敏感,曾经设想过,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全景式描述这一大战役的文学作品,那肯定能给人巨大启示;只是我那时候太年轻,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兵,既无法全面了解战场形势,更不可能知悉运筹帷幄的将帅们高超的战略部署,只能把这一愿望深藏于心中;但那是一团火,长久炙烤着我;以后在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工作时,又看到刘、邓二位统帅的副手张际春将军指出的:“我们只会创造历史而不会记载历史,但人们往往是从记载的历史中去了解历史的。”更感到,作为一个部队作家有责任去记载、描述那场大战役;幸运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部队的各级指战员多数都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,每个人都有一段独特的感受,和他们接触时有意无意都能获得许多素材,我对那场大战的了解也日益增加。进入新时期后,我决心把这一题材列入写作计划,也就更用心地去搜集素材、阅读战史、找人访谈,那场大战役的